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著．－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3102-1

I. 吴… II. 吴… III. ①吴枫－文集②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674 号

责任编辑：王景桐

吴枫学术文存

吴 枫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5%印张·350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6.00 元

ISBN 7-101-03102-1/K·1340

目 录

评《贞观政要》·····	1
开元天宝盛世新探·····	12
刘晏理财与用人·····	30
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	34
略论晚唐时期三省职权的转移及原因·····	49
封驳制度与唐初政治·····	56
中唐的财政危机及其对策·····	66
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84
关于日本学者对隋唐史的研究·····	120
唐代三书与三体·····	133
“两唐书”说略·····	137
1978—1988 年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述评·····	148
关于唐代历史文献的再认识·····	166
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	185
从分合大势看南唐的历史地位·····	208
唐代养生文化论稿·····	229
古典文献的源流与分类——中国古典文献丛谈(一)·····	241
四部书的构成及其流变——中国古典文献丛谈(二)·····	248
类书、丛书与辑佚书——中国古典文献丛谈(三)·····	257
经书引论·····	266
史书引论·····	276

子书引论·····	290
中国古典文献在日本的流传·····	301
中国古籍数量述略·····	317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评介·····	321
中国历史文献学·····	325
《珠玉抄》考释·····	346
我和古籍整理研究·····	358
加强史学研究中的信息工作——从隋唐五代史研究谈起·····	369
努力开创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为纪念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	374
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感与史学研究的革新·····	388
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与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	402
关于改革中国古史研究的思考提纲·····	410
勿以成败论英雄——略评项羽·····	418
中华民族创造力与凝聚力的源泉——《中国的智慧》序言·····	433
弘扬中华思想文化 从前人的智慧中寻找启迪——《中华 思想宝库》序言·····	440
中华儒学的强大生命力——《中华儒学通典》序言·····	455
中国道学发展流变——《中华道学通典》序言·····	462
繁衍文化的壮举——《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	466
中华古训浅议·····	470
吴枫教授简历·····	474
吴枫著作论文简目·····	476
编后记·····	481

评《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它成书的时间，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两唐书·吴兢传》文字简略，没有记载吴兢编纂《政要》一书的事。宋代的《直斋书录解題》、《郡斋读书志》、《馆阁书目》以及《玉海》等重要目录文献著作也没有明确注明《政要》成书的年代。其中《馆阁书目》，仅注有“神龙中（公元705—706年）所进”字样，很不可靠。《玉海》编者王应麟从《政要》序言中考证得知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八、九年（720、721年），是有根据的，并且为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所采用。但是，序言的年代并不就是成书的年代。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文献材料来看，《政要》的成书具体年代，目前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大约是吴兢在史馆任职时，即705年到721年之间编辑的。正如他在进表中所说“早居史职，随事载录”^①，逐渐搜集积累材料而编成书。

《政要》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全书不过八万字，简明扼要，条理清晰，风格别致，体式新颖，在前代古典文献中是少见的。既不同于经书，也不同于史书；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淮南子》、《新序》、《说苑》一类的书籍，虽然与之近似，但也有很大区别。所以过去在古书分类中甚至无法处理，只是勉强地把它列入史部杂

^① 吴兢《上贞观政要表》。

史一类。本书在有限的篇幅中,搜集了唐太宗及其臣僚们的主要言论,分门别类,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成书。

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书?应从两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唐太宗时期,封建统治者肯于接受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能够正视社会现实问题,唐太宗及其臣僚的所谓嘉言善行,值得人们传颂。一是武则天去位以后,唐朝统治开始出现危机,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斗争严重,李唐子孙已经忘记了祖先创业的艰难,特别是对太宗的励精图治作风,需要加以提醒。因而,吴兢便以“贞观政要”为题,编定成书。目的在于既能歌颂太宗时代的德政与治术,也能用以告诫李唐的后继人,即所谓“惩劝人伦”,“克遵前轨”^①,以期唐王朝的永久统治。

《政要》编成后,收藏于皇家图书馆中。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这部著作,“书之屏帷,铭之几案”^②,被列为宫廷皇子皇孙的必读书籍。唐末宪宗李纯、文宗李昂、宣宗李忱,奉为经典,反复阅读,苦心研讨,无不慨然仰慕太宗的政绩,对复兴即将衰落的唐王朝曾经起过一定作用^③。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宋仁宗赵祯非常欣赏唐太宗任人以“德行学业为本”^④。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朝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⑤。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

① 吴兢《贞观政要·序言》。

② 戈直《贞观政要·序言》。

③ 参见《唐会要》、《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等书。

④ 《玉海》卷四九。

⑤ 《明史·礼志》。

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曾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①由此可见这部书对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和作用了。

《政要》一书,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他们摹仿中国,也把《政要》定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材。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②。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③。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一千多年来,中外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重视这部书,倒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殊癖好,而是由于当权者确实感到《政要》是一部治国安邦的教材,可以从中吸取统治经验,学到统治权谋,用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于历代当权者的重视与提倡,本书的刊行十分广泛,流传到今天的各种版本很多。仅就我们所知,古写手抄本计有十九种(中国三种,日本十六种),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十二世纪以前的抄本。木版刊行的计有十二种(中国七种,日本四种,朝鲜一种),其中中国最早的版本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王氏勤有堂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日本最早的版本是长庆五年(1600年)活字刊本。长

① 《乐善堂集》卷七。

② 日本《国史资料集》第2卷,龙吟社版,第461页。

③ 藤木邦《日史》,1956年东京大学版,第226页。

期以来,辗转流传,而使诸本“体式大异”^①,内容也有出入,互不统一^②。

元朝儒臣戈直根据各种古本,加以校勘注释和按语,重新整理编辑,并搜集唐、宋各家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二十二人的论断,附于章末,刊于元至顺四年(1333年)。这是《政要》第一次整理本,通称为戈直集解本(简称“戈本”),是国内外流行最广泛的本子。“戈本”共十卷四十篇,根据目前传世最早的古写本来校对,和有关文献材料的证明,“戈本”与原书出入不小。其中论纳谏第五所附直谏篇,并不是吴兢的原著,而是后人增补的,多取材于《魏郑公谏录》等书。《政要》第二次整理本是清朝席世臣的校订本(简称“席本”)。席世臣只是根据“戈本”作些文字上的订误,所以“席本”与“戈本”的区别不大,实际是一个本子。“戈本”虽然是较完整的本子,但也有不少误谬疏漏之处。清末杨守敬、罗振玉等人都有过重新整理《政要》的打算,可惜没有结果。因之,明成化元年(1465年)刊刻戈直集解本一直流传到今天。1978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贞观政要》,就是以涵芬楼影印元戈直注明成化刊本加以标点印行的。

二

《政要》编者吴兢(669—749年),唐朝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关于他的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从今天所能见的材料中,概略可知吴兢的为人,性格爽朗,正直不阿,勤奋好学,对古代经书和史学都有一定研究,特别是对历史学有较深

① 森立之立夫《经籍访古志》卷三。

②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五。

的造诣。青年时期,他结识了当代著名人物魏元忠、朱敬则等,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教益。像魏元忠的公正坦率、不畏强暴的品质,朱敬则的直言好谏、喜欢交游的性格,都对吴兢有所影响。约在武周圣历三年(700年)前后,由宰相朱敬则、魏元忠的推荐,吴兢被召入唐朝史馆,与当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徐坚等人一同编纂史书,并成为亲密朋友。五年以后,吴兢由右拾遗升任右补阙,列入谏官行列。在唐室诸王的争权夺利斗争中,他曾上疏皇帝,谏止诸王骨肉相残,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颇受当代人们的重视。

颇有政治见识的吴兢,对澄清了七八年混乱局面的唐玄宗很敬仰。他热切希望颇有作为的新皇帝能够接受教训,重整旗鼓,治国安邦,使唐王朝得以长期统治下去。因此,他大胆而直率地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要求皇帝纳谏,认为否则“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说言为戒,桡直就曲,斲方为刃,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①!从而进一步陈述了自古以来,帝王不受纳臣下建议,终究是会灭亡的历史教训。他请求玄宗要以隋炀帝钳人之口为戒,学习唐太宗“好悦至言”的作风^②,多听臣下意见。唐玄宗很重视和信任吴兢,约在开元三年(715年)前后,吴兢升任谏议大夫、太子左庶子等官,并兼文馆学士。不久,又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

开元中叶,唐玄宗李隆基开始怠于政事,奋发图强的精神已大为消失,励精图治的作风已大为减弱。在所谓“开元盛世”的年代里,唐王朝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问题,如府兵制破坏,地方藩镇兴起,冗官日益增多,统治机构逐渐瘫痪,特别是某些地方的土地兼并剧烈,人口流亡,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复杂化。吴兢针对这些社会情况,向玄宗提出八点建议:“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

①② 《新唐书·吴兢传》。

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①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得到玄宗的重视和朝臣的支持,反而遭到冷遇,甚至是排斥与打击。

开元十七年(729年),吴兢被贬官,出任荆州司马,后又历任地方郡守,辗转迁任,不得重用,悄悄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吴兢终生致力于学业,家中藏书很多,有《吴氏西斋书目》。平生著述,见于著录的有《梁史》十卷,《陈史》十卷,《齐史》十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备阙记》十卷,《唐春秋》三十卷,《太宗勋史》一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二十卷(与刘知几等人合撰),《睿宗实录》五卷,《唐高宗实录》十九卷(与刘知几等人合撰)^②。可惜这些著作均已散佚,只有《贞观政要》一书传至今日。

吴兢是当时著名学者,比较进步的史学家。他与进步史学家刘知几是亲密朋友,对治史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修撰史书,力求言简意赅,反映真实社会情况。景龙中(708年前后),他在史馆工作时,十分鄙视某些史官畏惧权臣武三思、张易之等人,修撰史书“苟饰虚词,殊非直笔”,多与事实不符。因之,他私撰《唐书》、《唐春秋》等书与之抗衡,目的“在乎善恶必书”,惩戒贼子乱臣^③。不言而喻,吴兢的史学观点、立场和方法没有脱离封建地主阶级唯心主义史观的范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历史学家。

三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分类编撰贞观年间

① 《新唐书·吴兢传》。

② 参见《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

③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部》。

(627—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和身边大臣们的政论和奏疏,以及有关重大政治设施等。它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通典》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较为详尽而具体,为我们研究唐初历史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人们熟知的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继秦皇汉武之后的著名帝王,是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即位以后,在隋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推动下,吸取前代封建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励精图治,敢于正视社会现实,部分调整了阶级、民族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作了一些有益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工作,并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本质上和历代封建统治者没有区别,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他的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作为,严重地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属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太宗统治后期,意志衰退昏朽,渐恶直言,大兴土木,畋猎巡游,生活逐渐腐化,政治日趋黑暗,已暴露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

《政要》一书,采摘了唐太宗和四十五位大臣的有关政治言论。大臣中最有名的人物有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温彦博、刘洎、马周、戴胄、孔颖达、岑文本、姚思廉等人。他们都是唐初政局中的要人,在太宗身边负责有关工作,虽然各人的身世、经历、社会地位、思想学识以及官职有所不同,但是却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他们和唐太宗同是处在隋末唐初社会矛盾斗争的尖锐时期,农民革命风暴给他们以深刻地教育和影响,因而他们的头脑较比清醒,能够认真地对待社会现实问题,分析、讨论和解决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第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通晓儒家经典治术,懂得儒家治国安邦的道理,对社会事物

比较敏感;第三,他们熟悉历史,知道暴秦是怎样灭亡的,两汉是怎样衰落的,更了解南北朝时代黑暗混乱的历史局面,同时都亲眼看到隋王朝的结局,因而他们肯于总结经验,接受历史教训。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敢于评论时政,直言进谏,面对太宗陈述个人政治见解。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当时出色的政论家。他们忠心耿耿,犯颜直谏,正直不阿,为了地主阶级国家利益,甚至是不顾个人安危,在至高无上的皇帝面前,敢于说出一般人所不敢说的话,敢于做出一般人所不敢做的事。

《贞观政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太宗君臣论政的主要内容。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问题非常深刻,可概括为以下十点:

第一,确定治国方针。他们认为,治国犹如栽树,根本巩固,则枝叶繁茂;治国犹如养病,病好之后,也须谨慎。所以主张:“大乱之后,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他们由于接受了农民革命风暴的洗礼,被迫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把国君比作舟,人民比作水,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主张:“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统治者应当“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封建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缓和与顿挫社会阶级矛盾,以维持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

第二,接受历史经验教训。他们认为,秦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始皇及二世的暴虐;汉之所以衰弱,是由于武帝之骄矜;隋朝之所以覆没,是由于炀帝任用邪臣,护短拒谏,臣下钳口,诛求不已,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南北巡游,穷兵黩武,三侵高丽的结果。因而他们极力抨击历代昏朽的封建皇帝,而仰慕前代所谓圣明君主的德政治术,“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

第三,选贤任能。他们认为,“治之安危,惟在得人”,即所谓

“安天下者惟在得贤才”。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官员选拔工作，太宗自称“梦寐以求忠贤”，曾将州郡刺史名单书于屏风，记其功过，以便奖惩。当时规定的选官标准：一是德，二是才，三是影行。所谓“德”就是道德品质，为政治标准，被列为首位；“才”是业务能力；“影行”是实际表现及民众反映。当然，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和实际表现都具有严格的阶级标准。

第四，精简机构，严申法律。为了加强国家机器职能，他们十分注意调整机构，简化组织程序，尽量少用官员。即所谓“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如此既可减轻百姓负担，又能提高工作效率。严明国家法律，一方面认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以便于官员掌握；另一方面主张废除前代酷刑，以示“宽平”。他们指责当时司法工作中的最大流弊：“屈申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忽视律令法典，单凭长官意志。为防止冤狱错案，规定凡属重大案件或处决死囚，须经三覆五奏，而后定案行刑。

第五，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统治阶级内部强调君臣关系，他们把国君比作元首，臣僚比作股肱，只有君臣契合，才能治理国家，维持统治地位。为此，特别申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彼相信守，相得益彰”，“长守富贵”；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则强调统治者的“内省”。他们认为，“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对人民群众要作些必要的让步，提供和创造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使之永远为统治者效劳；处理民族问题，虽然仍采取武装镇压、分化瓦解以及怀柔麻痹相结合的方针政策，但强调安定边疆，设置羁縻州府，给少数民族以形式上的自治；任用其上层分子，不过分地歧视和排斥少数民族，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第六，培养后继人。他们深切地感到取天下之困难，守天下之不易，要使长久维持唐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必须培养后继人。因而

非常注意对太子、诸王及贵族子弟的教育与培养工作。教育他们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培养他们忠于唐朝王国的道德品质，告诫他们深居宫中不知民间疾苦的危害性。唐太宗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自己的皇位继承者，就连吃饭穿衣、乘船骑马等生活琐事也不放过，告诫子孙了解稼穡之艰难，取得天下之不易。

第七，君臣谏诤。贞观年间，魏徵等人的“直言敢谏”，唐太宗的“从谏如流”，成为一代政治风尚。魏徵、王珪、刘洎、褚遂良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谏官，他们所谏的内容，上自国家大政，下至宫廷琐事。魏徵一人仅在贞观元年前后就进谏二百余事，并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著名论断。唐太宗虚心纳谏，提倡和鼓励臣下谏诤，即所谓“每有谏者，从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有的谏诤言辞过激，甚至是酸辣刺耳，他也能够顾全大局，从地主阶级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虚心纳谏。

第八，谦逊谨慎。他们从历史上得知，秦始皇、隋炀帝是由于骄矜而败，周文王、汉高祖是由于谦逊而兴。因此，以太宗为首的唐初统治者“以古为鉴”，“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出一言，行一事，都思之再三，十分小心谨慎。他们认为，骄矜是败德之源，浮躁是灭国之由，统治者要时刻警惕自己，所谓“居安思危”，“理不忘乱”。

第九，防止奢情。太宗把贪婪的统治者比作“饕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因此他认为：“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①从此观念出发，唐太宗曾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奢情，节用民力，而不专求声色犬马与楼台殿阁，并规定王公以下宅第、车服、婚嫁与丧葬等都不得随意浪费。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十一月条。

第十,尊崇儒术。他们追尊孔丘为“先圣”,提高儒家社会地位,凡属前代名儒大师都力加推崇,也重视当代儒家学者,随时予以褒奖。召集名儒编纂和整理儒家经典著作,以适应新的统治需要。同时,他们认为,“为人大需学问”,不注意学习儒学与历史,就不能胜任工作,处理政务。

《贞观政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部古典文献。本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掌故,更重要的是给后世遗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阅读和研究这部文献将能从中得到许多启示和教益。但是,由于编者的阶级立场和时代条件所限,只是选编了唐太宗时代君臣论政的一部分内容,而且是一部分所谓嘉言善行,即值得宣扬的所谓德政与治术。所以这部书是歌功颂德有余,批判贬斥则不足。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言行并没有辑录,或很少记载。《政要》没有全面反映当时政治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这部文献资料,不加以考察与批判,论断唐初历史人物与社会问题,则所得出的结论,将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原载 1979 年《东北师大学报》第 2 期,亦收录于
1982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开元天宝盛世新探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曾出现过闻名中外的汉、唐、明、清四大王朝。每个王朝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都代表着一定的历史进程,而且具有时代的内容与特征。每个王朝都有自身的兴亡历史,但它不仅是一个王朝本身的历史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一个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讲,王朝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唐王朝起于公元618年,止于907年,经历二百九十年,上承两汉,下启明清,在中国古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712—755年),是唐王朝的黄金时代,一向为人们所称赞,誉之为“盛世”。它可与汉代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87年)和明代洪、永、熙、宣四朝(1368—1435年)以及清代康、雍、乾三朝(1662—1794年)相媲美,都是中国古代史中的重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有显著提高。全国户数已超过九百万大关,人口接近五千三百万,实际垦田数字约在八百万顷到八百五十万顷之间^①。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前代的最高水平。当时,不仅在中原地区垦田兴盛,而且在边远的东北营州、西北凉州与西南桂州等地也有较大的进展。所谓“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②。广大群众兴修许多水利工程设施,合理利用土地,改进农

① 汪篯《唐代实际耕地面积》,《光明日报》1962年10月24日。

② 《次山文集》卷七。

业生产工具,培育良种,改善耕作技术,加强田间管理。北方陕南、汉中一带开始实行二年三季粟麦轮作,南方稻麦轮作一年两季或二年三季,从而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手工业生产门类很多,有冶炼、铸造、采矿、造船、纺织、印染、刺绣、雕刻、木器、陶瓷、造纸、煮盐、制茶、酿酒、皮革、服装等几十种以上。不少作坊生产规模很大,分工精细,人身隶属关系有所松弛。官营作坊中“和雇”工匠的比重不断增大,私营作坊中出现了早期的雇佣关系。某些部门生产技术大有提高,如冶炼业的“合金银并成”以及“开元通宝”钱样采用先进的腊模铸造法^①,金属器皿制造中使用简单的小型机械车床等^②,都是当代的突出成就。纺织业产品种类很多,产量丰富,仅麻纺织产品即达二十余种。据统计,天宝时期唐朝每年税收绢布折合公制计算已达一亿七千二百一十万平方米,当时全国每人可分三点五平方米。这仅仅是税收数字,当然实际产量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开元天宝时代的商业也很兴盛。全国商业城市增多,水陆交通便利,驿站制度完备,以长安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驿站,驿路总长将近五万余里^③。各地联系广泛,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雒,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④。商品交换发达,市场物价比较稳定。据文献记载,开元十三年(725年),北方米价一斗十三

① 《唐会要》卷八九。

② 《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唐代金银器》,《文物》1972年第1期。

③ 《大唐六典》卷五。

④ 《册府元龟》卷五〇四。